

文艺辣评

# 别让军人形象陷于戏说

赵卫国

不能塑造出生动丰满的军人形象，是衡量一部军旅影视剧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在现实军事题材创作中，许三多、蒋小鱼、冷锋等当代军人形象，家喻户晓、栩栩如生，给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与作品本身交相辉映，永存光影画廊。同时也有一些作品中的军人形象面孔模糊、千人一面，辨识度较低，在人物塑造上存在简单化、脸谱化倾向；但更有一些作品把当代军人塑造得乖戾暴戾、个性极端，毫无生活基础和基本逻辑，用偶像造星的路数吸睛吸粉，把饰演军人形象当作噱头，过于娱乐化庸俗化，陷入戏说的创作误区。

例如，有的军人形象天赋异禀，生而知之，霸总附体，初入军营即吊打碾压一众老兵骨干，兵王天成；有的军人形象为演兵王而演兵王，动作值武力值拉足拉满，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独来独往，嗜血冷暴，与杀手别无二致；有的军人形象在别墅豪车与部队军营间自由穿梭，在多个女友间潇洒游走，温柔富贵乡，沙暖睡鸳鸯，观众不禁要问翩翩贵公子，何以披戎装？有的正面军人形象由以演反派成名且深入人心的演员担纲，尽管演技在线，但一颦一笑颇有胡汉三潜入我军内部充当总司令之感；有的军人形象假肌肉、整容脸、大鬓角，滤镜全开，过度美颜，军装配饰随意，追求颜值即正义，却忽略军人自身的气度神韵；有的军人形象过于强化性别特征，把军

装改小收紧，妆容过浓过重，枪林弹雨间涂脂抹粉，重风情而轻风采，把花木兰演成了李师师。广大观众和部队官兵对这些现象深恶痛绝，边看边差评，竟相打低分，甚至把观剧的重点由剧本本身变成了看吐槽弹幕。这些作品往往有了热度、有了数据，却丢掉了最为重要的口碑，美誉度极低，且严重挤压了军旅正剧大剧好剧的生存空间。有的制片方对现实军事题材驾驭比较吃力，对年轻化表达的网生内容把握不准，从而导致以赌博的心态搞创作，一味迎合而忽略引领，迷信流量无所不能；有的创作者缺乏军旅生活积淀和感悟，脱离生活乱杜撰，胡编滥造撒狗血，引入人胜第一集，情节内容本身的

浮随意，在二度创作后使问题更为放大叠加倍增，让军人形象淹没在荒诞离奇的剧情之中；在国家下大力清理整顿“饭圈”乱象、营造天朗气清的行业新风和山清水秀的文艺生态的大形势下，选择军旅剧转型变身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有的作品因人设剧，量身定制，演员本身的形象气质并不适合饰演当代军人，反而为了打造主角光环，凸显咖位，于是便不合逻辑地强行改戏删戏，自以为油头粉面、放荡不羁和个人英雄主义是对军人形象最好的塑造。

现实军事题材影视剧创作，门槛高、风险大、思想强、审查严，必须不忘初心初衷，端正创作态度，坚持正确审美，弘扬创作新风。编、导、演、制等主创人员要深入生活，感悟生活，而不是从网络爽文和外国大片中去体验生活汲取灵感；要真正走进军营，贴近兵心，而不是当做一种宣传手段，前呼后拥、蜻蜓点水般地走一走逛一逛；要入心入脑地感受当代军人的所思所想和血肉风骨，而不是急于把通告、合影、握手等晒上自媒体写人宣发稿。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在深入生活中把准创作方向、坚定价值引领、筑牢内容基石，始终秉持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健康审美情趣，以演技和形象气质与角色剧情适配作为根本标准，洗尽铅华、脱胎换骨、刻苦钻研、磨炼演技，全身心投入角色创作，追求德艺双馨，才能描绘好当代军人形象，铸就永恒军旅经典。

# 对基层社会的深情凝视与深刻剖析

——看赵冬苓编剧的《警察荣誉》与《幸福到万家》

斯元



▲《幸福到万家》借助导演、编剧和赵丽颖的IP效应，刻画了女主角何幸福进城学习最终成长的“大女主”线  
▲《警察荣誉》以基层民警的“职场剧”为外壳，经由民警对老百姓纠纷的调解，让观众窥见基层中国的深刻复杂性

《幸福到万家》收官，而同样由赵冬苓编剧的《警察荣誉》则以8.6分位列今年迄今豆瓣国产剧口碑榜第二。从《警察荣誉》到《幸福到万家》，都聚焦了对基层中国的透视与剖析，成为今年电视剧市场不能不提的“现象剧”。

《警察荣誉》的“主角”是一个基层派出所，故事发生在城乡结合部。这一回《幸福到万家》，故事发生地“万家庄”则是一个农村。无论是城乡结合部还是农村，都是基层社会的核心部分；与这两个区域相对应的，则是如今影视剧里扎堆出现的豪华大都市。此前国产剧备受诟病的一点是：主人公非富即贵，都是“精英”的化身。精英叙事固然有讲述的价值，但如果目之所及都看不见基层、没有普通人，也是对现实的一种遮蔽。

《警察荣誉》以基层民警的“职场剧”为外壳，经由民警对老百姓纠纷的调解，让观众窥见基层中国的深刻复杂性。而《幸福到万家》则借助了导演、编剧和赵丽颖的IP效应，刻画了女主角何幸福进城学习最终成长的“大女主”线。在叙事策略上，《警察荣誉》与《幸福到万家》也是高度相似。一则呈现基层中国的复杂性，尤其是“人情”与“法治”之间的博弈；二则在“法”“理”“情”三者之间达到平衡，既尊重法治精神，也与中国的基层社会相适应，奔赴更文明的前景。

法学家梅因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置换到中国基层社会，“身份”相当于“人情”，“契约”相当于“法治”。一个发展中的中国，也是从“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过渡过程。在传统的人情社会里，人与人之间讲的不是契约与法治，而是依照血缘、地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亲疏远近以及规矩礼俗。

《警察荣誉》中，城乡结合部是“人情”与“法

治”碰撞的激烈地带。剧中最让民警焦头烂额的，往往是那些刚“上楼”的农民之间的纠纷。比如丢了一只鸡，都能变成两个村落之间的群众纠纷；老人遛狗不牵狗绳，把路过的小孩吓坏了，警察劝说老人得牵狗绳，老人顶嘴：我在农村活了大半辈子，就没牵过狗绳……

《幸福到万家》中，万家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虽然万家庄是一个十里八乡最富裕的农村，但这里的法治观念依然非常落后，万家庄仍然是在“人情”的基础上运转的。村支书万善堂（刘威 饰）是带着全村脱贫致富的功臣，是村集团万家庄集团的董事长，也是村里最具话语权、最受尊重的“长老”。万善堂维持、协调着“人情”的运转，很多时候他也是通情达理的。比如当何幸福（赵丽颖 饰）早产时大出血，亟需输血，万善堂还是“不计前嫌”，第一时间通过喇叭号召全村人去献血，挽救了何幸福的命。但人情社会存在的一个严重弊端的是，它严重依赖于“长老”的个人素质，并且“长老”的权威不可挑战。一旦“长老”不懂法，那么他对很多事情的处理就只能凭借个人意志，可一旦有人挑战他的权威，还会遭到全村人的排挤和打压。

《幸福到万家》在前半段的核心戏剧冲突，就是何幸福一再地向万善堂要说法、一再地挑战他的权威。再到万善堂儿子万传家（曹征 饰）以闹婚名义对何幸福的妹妹何幸运（张可盈 饰）进行猥亵的风波，到村里的征地风波，再到万善堂踢伤何幸福的丈夫王庆来（唐曾 饰）风波，身边几乎所有人都劝何幸福“息事宁人”，但何幸福就是要分辨出个是非对错。万善堂、万传家则对何幸福一家进行各种打压。一个农村新女性的成长背后，也是基层中国的地位受到威胁——如果村里的人都讲“法”了，自然也就不需要他们依靠“人情”去处理各种利

益纠纷了。

作为有着丰富基层生活经验的资深编剧，赵冬苓知道在一个僵化的环境里“改变”的困难，不避讳地呈现了法、理、情之间的妥协，但也正因如此，网上对剧情发展的争议也在聚集，比如《警察荣誉》中，一对年轻的夫妇最终放弃起诉刁蛮无理的骚扰者。从警察的角度看，起诉过程耗费很长时间，年轻夫妇的生活也就没有很快恢复到平静，所以务实一点的办法是选择和解。但从公众的角度看，如果选择和了解，就是对恶人的一种纵容？赵冬苓对这个争议做出的解释是：“社会就是在这种反复拉扯中不断进步的。如果只看到妥协和忍让，看不到在这过程中社会的进步，那是一叶障目。但如果只希望看到正义的实现而不希望其中存在着任何的妥协与综合考量，那也是不切实际的。”

回到《幸福到万家》，法、理、情又该如何平衡？当何幸福一路上告时，镇里的公安、县里的法官都过来“劝和”，这让何幸福的代理律师关海（罗晋 饰）很吃惊，他严肃痛斥这种和稀泥的做法。但退一步说，法官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在征地风波中，村里要建保健品厂和污水处理厂，这关系到万家庄乃至整个县的发展，工期不能跟着官司一直耗下去，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应该找到一个均衡点。

无论如何，对这个时候的万家庄来说，当务之急是打破“人治”，让“法治”取代“人情”；农村的富裕不仅仅指涉的是物质上的富裕，还包括精神文明的焕然一新。在被“赶出”万家庄后，何幸福到城里学习法律，之后又回到万家庄，不仅开办了民宿，更给万家庄带来“法治”之风。一个农村新女性的成长背后，也是基层中国的变化缩影。《幸福到万家》由此实现以小见大的现实主义表达。

## “第三只眼”看文学

恕我直言，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坛，杨争光本是一个很难抹去的客观存在，虽称不上十分高产，但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2年移居深圳之前，他较为集中地冒出的那些短篇《从沙坪镇到顶天岭》《蓝鱼儿》《高潮》，以及中篇《黑风景》《棺材铺》《赌徒》《老旦是一棵树》等，都是风格十分鲜明的独特存在。仅凭这些就足以奠定他在整个中国文坛而不仅仅限于陕西的独特位置，这些作品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也依然并不逊色。长篇小说创作每一部之间间隔的时间虽长了点，但也有《越活越明白》《从两个蛋说起》到《少年张冲六章》这样三部可圈可点之作。谈不上多，但肯定也不能谓之低产。说句俗套的话，这样的产量特别是质量与杨争光现有的“知名度”与“江湖地位”显然不够匹配。

杨争光？“开罪”于整个文坛显然不全是客观事实，只好从杨争光本人身上找缘由了。我想了一下，至少可以数落出两条原因：一是此君“用情不专”、有点“花心”，写小说就好好写小说，但他却不时又飘移到影视圈中去“票”上一把，不少人未必知道或已然遗忘，这个杨争光还是电影《双旗镇刀客》的编剧，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编剧之一和《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总策划，这些个影视剧虽都有不错的口碑及市场影响力，但就接受者而言，为人们所记住的往往首先是明星角儿，其次是导演，至于编剧嘛，则且往后排着呢。更何况杨争光在这一领域也无“长性”，若真像刘恒、朱苏进那般一猛子扎了进去也绝不至于此。二是自打他1992年从西安移居深圳后，小说创作的产量也着实少了点，特别是彼此面世的间隔时间还不短。在当下这个以“急吼吼”为特征的岁月中，又有几人还能耐得住性子惦着您呢？

就是这部小长篇新作《我的岁月静好》距他自己上一则作品《驴队来到秦先畴》面世的时间又过去了整整十年。当然，从这部新小长篇的“后记”中，我得知杨争光在2012年竟突如其来地患上了抑郁症，那种既“没有纵身一跳”的勇气，又终日“生不如死”的感觉能撑出头已属不易，哪还顾得上写作的节奏。说句不厚道的话，也正是因为杨争光能够从这场“劫难”中死里逃生的遭遇，才勾起了我阅读他这部新作《我的岁月静好》的强烈欲望。

据杨争光自述，“冀望岁月静好者似乎越来越多，自以为岁月静好的们在微信朋友圈的晒好也就格外显眼。”于是，这就刺激了他“想探究一下静好们的静好以及何以能够静好”？说实话，争光想“探究”的亦是我所好奇的，当然，我还有一层好奇就是想知道杨争光在经历了这样一场生死劫后会产生哪些变化？当然，真正的“岁月静好”也确是本人向往之的一种境界。

如果作品不署名，只是看其文字，大概率不会将《我的岁月静好》与杨争光其名联系起来，不仅语言，包括结构、故事和他过往作品的差异都比较大。作品的故事倒是很简单，那个“我的”“我”就是一个名叫德林者，作品主要说的就是他到青年到逼近中年的那段“岁月”。在他所在的那个县城，这也是有影响力的人，在档案馆至今还保留着他初二时的一篇作文。德林在县城一个中专任教时与自己的同事马莉也算是自由恋爱结婚，后来他考上了师大哲学系，继而又攻读了师大文学院纪录片专业的研究生而留在了省城。夫人马莉为了来到省城，也考上了研究生，一家人在省城过上了平平淡淡的日子。其实，就过日子而言，大多数国人何尝又不是如此呢？不过，在这个普通的家庭里，平淡的日子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没有波折；或许是因其过于平淡，倒是在这个家庭处于相对被动一方的妻子马莉率先有了外遇而提出离婚，而还在县城郊外的德林家老宅因其拆迁补偿的纷争又面临着被强拆的风险……

杨争光在自己的这则新作中所表现的大抵就是这样一段“岁月”。依常理，一个家庭的日子过得平平淡淡并不稀罕，但这个家庭在面临夫妻解体、老宅被强拆这样尴尬的“岁月”时，恐怕也就很难继续“静好”了。但杨争光却偏要“静好”如故，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在并不静好甚至至凄凉的岁月里，却能拥有静好的岁月，是要有一些超常的能耐的”，因此，“探究一下静好们的静好何以能够静好”就成了这部小长篇的主旨。

那么，这种“探究”的结果如何？杨争光在自己的新作中给出的答案就是那个曾经在县城“也是有影响力的人”德林进入省城后竟然活成了一个十足的以“看客”为生活之法则的所谓读书人：看邻里现场杀人，看自家老宅被强拆，看夫人提出离婚，看自己在夫人有了外遇且已经提出了离婚诉求还依然故我地继续与之过着夫妻生活……而作品的二号人物马莉的言行

# 『岁月』虽『静』，真的『好』吗？

——看杨争光长篇小说新作《我的岁月静好》

潘凯雄

虽不及德林那般“淡定”，但其表现也是够“可以”的了，尽管是自己率先提出的离婚，但面对丈夫要求的夫妻生活，虽也有不从之时，但更多的时候则还是给予配合。如此荒诞不经的“岁月”，竟然激不起半点涟漪，不吵不闹、不怒不打，反正就是“不折腾”，的确十分“静好”。

这样的逻辑自然是反常态反逻辑的。一个敏锐的作家不就是要抓住这个“反”字做文章吗？而且还要做足。我想，杨争光的《我的岁月静好》就是这种牢牢抓住反逻辑的典型。其实，当这种反逻辑行为一旦走向极端时，问题也就随之浮出了水面：这样的“静好”真的“好”吗？面对这样的问题，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大概率都不会给出答案，而是让读者自己去认识、去直面、去思考，这，或许恰是这部作品最大的价值之所在。

面对生活中的如此尴尬，依常理，置身于其中者即便是外在言行上可以尽力克制掩饰，面子上也可以做到波澜不惊，但内心不时泛起些许涟漪总是难免，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然而，杨争光笔下的德林与马莉，无论是行为还是内心的表现统统就是“静好”，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仿佛一切与他们无关。如此“静好”如果不是那种“精致利己主义者”的一时之忍，就只能算是极端十足的麻木与麻痹，德林与马莉显然是后者，他们彼此实在没有隐忍的半点理由。

由十足的麻木与麻痹导致的这种“岁月静好”，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当下我们社会相当程度存在着的一种病态。目前在我们社会生活中两种司空见惯的极端现象一是“喷子”不少、戾气太重；二是“躺平”者众、“静好们”多。在我看来，杨争光创作《我的岁月静好》其锋芒所指正是后者，他不仅用一种近乎荒诞的艺术手段平静地将这样的“静好”呈现于世人，也冷静地观察到“静好们”之所以能够“静好”，既有他们个体“与时俱进的创新”，更有“悠远的祖传”。“静好们”貌似冷静平静理性，究其实这不过只是一种假相，他们对社会之危害在某种意义上比之于那些“喷子们”更恐怖、更具欺骗性。“岁月”如此之“静”，真的“好”吗？